

·学者对谈·

消费文化与消费革命

戴慧思 卢汉龙

对谈者:戴慧思(Deborah Davis),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汉龙(Hanlong Lu),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时间:2001年5月14日

地点:上海波特曼大酒店(Ritz Carlton Hotel)

消费作为观察与研究社会的一种方法

卢汉龙(以下简称卢):耶鲁大学戴慧思教授编辑了一本名为《中国城市消费革命》的书,2000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来自1997年在耶鲁大学召开的“中国消费文化”理论研讨会。会上有来自不同院校和系别专业的中国研究学者参加。会上提交的论文都是近年来作者在中国进行实地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像戴教授这样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更有不少是美国的中青年学者。他们都有在中国生活和从事研究的实际经验,对改革与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有切身的体会和社会学研究的现场第一手资料。他们分别从住房、儿童消费、饮食、闲暇等各个方面观察中国人经济生活的变化,对麦当劳、贺年片、婚纱摄影、迪斯科舞厅、保龄球、情感热线等消费现象进行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考察。该书的出版被评论为对当今中国经济消费领域作了全新的、系统的、纪实性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不足。^①确实,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了一场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社会变革。消费现象表面上是一种经济现象,但实际上更是一种社会文明。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又称商业文化,是经济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又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果的重要交接口,也是人的自我实现的表现形式。所以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和看待消费现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戴慧思(以下简称戴):确实如此,以前对消费的研究,除了经济领域与市场研究以外,从社会与文化方面,特别是对物质文化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人类学者做的,社会学者不太注意这个问题。照美国的经验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消费角度进行理论研究的大多也是人类学者,而不是社会学者。我想从理论上要回答这是什么原因不很容易。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如果说19世纪是生产者创造世界的世纪的话,那么20世纪则是消费者创造世界的世纪。

卢:这个说法耐人寻味。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物质生产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经济与生产越

^① 参见 Charles Tilly(*Durable Inequality* 一书的作者)对该书的评论,见该书的封底。

来越依赖于消费者,受消费者所指引。由于消费直接取得人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因此消费已不是一般的经济环节,而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动力。其实在中国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前,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会学界从市场调查的角度对消费现象的研究虽有所介入,但是很少涉及消费的社会理论问题。从90年代开始,消费作为市场化体制改革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后果越来越明显了,一种商业文化正在形成,不由你不去注意。但是戴教授你的确是最早思考如何从消费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学者之一。

戴: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引起的。我是在1979年第一次到中国来直接开始做研究工作的。你知道,那时如果你去访问一个人、一个家庭,你可以问他们的经济收入是多少,他们总会坦率地告诉你,没问题的,这是跟美国很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职工的工资都差不多,只要知道他是“八级”还是“五级”的工人,你马上就可以大致知道他的收入。那时虽然也有补贴和奖金,但是都十分相同与清晰,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收入。一直到1988年(80年代末)都是如此。^①但是从1992年开始改革的影响就蛮大了,人们开始不想告诉你自己的收入有多少,他会告诉你他的基本工资是200元,补贴是这些,但是不敢说第二职业的收入或者别的收入。到了1995年,我看得出来我再也不能问他们这个问题了,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对陌生人说他们的收入。我们安排一个调查,到他的家里说我是什么人,我要麻烦你作个访问,他同意了。后来我们就开始提问题,进展还顺利,但是问到收入这部分时,他觉得不舒服了,我也觉得不舒服。然而那时我们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改善,就是不愿谈到自己的收入。许多学者特别注意收入这个指标,因为他们都把收入看作是因变量。从理论上讲,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收入。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如果收入是你的主要因变量解释,你建立整个理论试图解释收入如何变化,社会财富如何分配。但是把收入看作是因变量,可能得到的结果从统计角度上看是很漂亮,但却是虚假的,说明不了问题。比如举个例子,你到一个工程师的家里看,他有新的电视、新的冰箱、衣着也不错,还可能有两室一厅的居所。你再问他的收入是多少,他告诉你的也许是基本工资,当时可能还没有超过500块钱。你又到了一个工人家里,他家里没有新电视、没有电话,住的是一室一厅或者只有一间房子,你问他的收入,他的基本工资可能是380或是400块钱。这样,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有100来块钱。但是我们知道这个100多块钱的差异是“买不来”这么巨大的差别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想什么指标才是最可靠的呢?我决定从消费方面看,可以用这样的指标来看人们的生活水平是高的还是低的,从这个方面来解决对社会地位问题的认识。

卢:对此我们也有同感。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很低。收入被定义为是“职工家庭的生活费收入”,所以受访者告诉你的只是社会上平均的生活费水准,当然不会有敏感性,这是大家都知的社会事实。但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收入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收入渠道多元化了,收入成为个人成就的一个指标,变得敏感起来。所以很难从他的经济或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判定他的收入水平。

戴:最困难、最成问题的可能就是抽样调查,因为相互之间都是陌生人。就是你把问卷表寄过去,让他自己填,谁能保证他们会告诉你真正的情况呢?

卢:这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做一些低收入家庭方面的调查。政府有专门的计划对贫困职工

^① 戴慧思教授从80年代中起在武汉、上海等地进行居民家庭的跟踪访问调查,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中国家庭时序生活变迁资料和调查的感性经验。

或家庭进行救助,现在越来越发现假如按照原来的地位指标去划分救助对象不正确了。比如说你下岗了,你应该得到补偿或救助,但其实也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有些人虽然下岗了,他还会有其他的收入,但是如果他不很确切地向有关部门申报收入的话,就难以判断。所以,现在有些地方在确定哪些家庭应该救助时,也要看他家里有没有新的添置,假如有新的贵重添置品说明他的经济情况还是可以的。这些是从方法论方面的考虑,我总觉得消费对一个社会来说还有更重要的指示作用在背后。譬如说现在中国书市里有不少翻译的关于美国消费方面的书,其中也看到好几本关于消费与社会阶级的书,他们都从消费问题出发,讨论美国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消费其实也是一种显示人的地位的一种方式,是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探测仪。

消费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

戴:是的,从理论方面来说,人类学者米勒(Daniel Miller),他是美国人,但在英国也有一批叫做社会人类学的学者,他们认为消费造就了一个人,通过消费你造就了自己。他们对社会结构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同时,他们对变革性的情况也不做分析,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20年以来你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改善的速度我认为是最快的。就是从1980年到1995年这15年里看得出来,农民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90年代在城市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

卢: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将西方15世纪以来的发展归结为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环节。他认为,日常生活的物质文明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市场意味着解放和开放,是与另一个世界接近的媒介。他把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原因,归诸国家的干预和阻碍,并以中国资本在国外得到的蓬勃发展作为反证(费尔南·布罗代尔,1992)。马克思曾论述过,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正由于有这两大领域的存在,才有了市场与经济。20世纪的市场经济,正如戴教授所说的,消费者成为了市场的主体。那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呢?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会以消费者为主体来实现的吗?在你编的《中国城市消费革命》这本书里,南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麦迪森(Richard Madsen 中文名赵文词)教授在他的“尾声”一章里用“第二次解放”来形容中国当前出现的消费革命。你怎样理解这个第二次解放?

戴:这是他的话,但是我可以同意。意思是中国人民的第一次解放是在1949年。它停止了那么多年的国内战争,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后来又开始建立人民公社,那时对经济结构也进行了改革,当然你可以说人们是解放了的。因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和平、安定,有足够的食物,而且大部分人都有工作,可以送孩子去学校读书,有健康医疗保障,这是一种解放。但是在60、70年代以后,许多人感到很悲观,我想你提的麦迪森所说的“第二次解放”是指这个意思。这是他的看法,不是我的。按照我的理解,他的看法可能就是中国的改革与开放第二次给了大部分中国人新的希望,他们可以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们的孩子有前途,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希望,对现在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孩子来讲将是一个新的未来,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再一次得到了解放。但我个人不认为50年代是第一次解放,90年代是第二次解放,对此我的看法可能不完全一样。

卢:但我有点同意他这个说法,因为我觉得第一次是指通过政治革命的一次解放,第二次我觉得指的是经济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解放。我一直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进行过两次经济体制的改革。第一次是在 1949 年建国以后到 1956 年对城乡“资本主义改造”结束。第二次便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不能将这两次改革割裂开来,而且将它们对照起来看反倒更有助于我们冷静地思考现在该怎样去做。第一次改革是政治革命的继续,加上“大同”的理想主义推动,结果形成一个僵化的国家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过度地强调了社会对经济条件的控制和意识形态为核心。第二次改革则是一场经济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和消费者的自主。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社会上的物质很匮乏,消费不发达。人们自我决定的生活范围很小。物质生活方面基本上靠国家与单位来分配,选择性非常之小。虽然有比较好的社会保障,但主要局限于城市。人们自我实现的机会不是很多,所谓“大家都吃大锅饭,过平均主义的苦日子”。从整个社会来说这种体制的活力不够,经济发展的效能很低。第二次改革带来的是一场静悄悄的消费革命,中国正在逐步完成货币化、商品化、市场化,乃至资本化的商业化转变。我觉得可以说随着经济生活的解放,每个人的生活自由度都有了增加,都能够不同程度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自己。第二次改革的主要结果是形成了消费者,有了消费者的自主性。人们能够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能够决定什么是他所想要的。消费者行为和投票者行为有同样的原理。消费者自主实质上从经济方面形成一种投票解决公共需求的模式,所以我觉得确实是一次大解放,不知道你觉得怎样?

戴:我同意你的看法,但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麦迪森也有悲观的一面,他有比较悲观的看法。

卢: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消费者自主也会有相应的问题出现。首先,消费者会普遍相信“钱能通神”,从而使整个世界散发“铜臭”,拜金主义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弊病,这也正是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等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次,就是要批评“消费主义”。最近几年人们其实也不断地发现,消费虽然对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假如消费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和引导,没有能很好地对待个人需求和社会利益的问题,协调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话,它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汽车消费引起环境的问题;比如说吸毒、嫖娼卖淫等不正当消费会影响社会风气的问题等等。所以,消费者的自主性也往往会有它的反面,但是我想这是一个鱼跟熊掌的问题。

戴:对,我们是学者嘛!你们提出来的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研究这些问题。同时,还必须看到消费也成为了生产的一个方面,美国就是一个例子。你可以分析一下 GDP(国民生产总值)从哪儿来的。美国在服务方面的“经济产值”现在就超过 50%。所以消费应该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指个人在家庭里的生活消费,但另一方面又是社会结构性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会到外面吃饭,还有旅游、接受社会性服务工作的消费。

卢: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注意和关心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目前第三产业的产值也已经超过 50%了,这被认为是一个现代化的指标。可以看得出来越是现代化的社会,消费真是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戴:因为一个人的消费是另外一个人的工作。

卢:说得太好了!这种有机的联系是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化的结果。从社会发展方面来看,生产者和服务者都离不开消费者,所以应该说消费对我们研究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是显得越来越重要。

戴:这个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当代历史肯定有用。在 50 年代以前农业是最重要的,工业没有那么发达;后来工业的比例增加了,它占 GDP 的比重逐年提高了。但是特别是在信息

革命、高技术(IT)革命兴起以后,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物质的生产变得越来越容易,知识、信息、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

卢:在西方,信息也一般被你们认为是一种消费吗?

戴:当然了,只是没有那么清楚。消费跟制造性产业的区别,以前是很清楚的。消费是消费,生产是生产。不过作为服务,包括信息服务,生产与消费的边界就不那么清楚了。

卢:但现在我们看得出来信息服务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包括现在互联网也可能要收费。

戴:对,比如说软件跟硬件。举一个例子。开始时IBM以为生产机器也就是硬件是最重要的,后来它知道硬件只是第一步,很容易被做到,但是赚钱的却是软件和服务,这是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消费与社会不平等

戴:消费确实是一个丰富而生动的研究领域,比如你说的吃、穿、住、行、交往等不同的消费场所和内容,是我们看社会的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谈一些整体的想法,然后用它来测试其他的一些理论。举例来说,你一定了解维克多·倪(Victor Nee,中文名倪志伟)关于“市场过渡理论”(market transition theory)。市场过渡论的基本观点是,如果允许直接的生产者控制经济生产的话,不仅会带来高的增长率,而且会带来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个理论原来是用在你们国家的调查结果推导出来的,认为你们引进市场化机制以后,变得越来越公平了。但是为什么我不同意呢?因为我看得出来,在我们美国的资本家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是靠市场的,但是在世界上我们是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所以我很难相信市场能带来公平。不过,这只是一个假设,维克多·倪也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讨论过,这是他的假设。好,这是他的假设,那我们怎么来讨论研究他的假设呢?一般的人都是用他的指标——收入分配指标来解释。我跟他讨论过,我认为这是不够可靠的。因为你看得出来,报告的收入是差不多的,你问一个陌生人,谁的回答都是中等的,最穷的你没有办法查出来,有钱的人他也不回答你。所以你选择收入指标,你就歪曲了事实,你得到的仅仅是中间部分,他真实的那一部分你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法。而消费则是一个好的切入点。理论上我们可以讨论很多很多假设。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我们1996年跟学生一起用小组座谈会研究儿童消费。当时一个假设就是关于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我们用好几个办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做各种访问,访问老师、访问父母、访问孩子等。我们可以问他们:你觉得男女平等吗?如何平等?假如你有一个女孩,你会怎么怎么样?当然,他也可能说了,但考虑下来这样的研究还不够可靠。我们的办法就是看他的消费方面。比如看他有女孩,或男孩,你不必直接去问他。比如你知道他的孩子是女孩,接着你就看他的生活怎么样,看他给孩子吃什么,穿什么,问他“你希望她将来做什么”。你不要去问他“你觉得女孩应该做什么”,或者“男孩将来该做什么”。我们就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研究这个假设。我们编写的好几篇文章都是这样的。所以,理论上假设从各个方面汇集拢来,但是我们用消费场所(题材)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为消费去研究消费,而是利用消费来挖掘其他问题。

卢:就是通过消费来认识许多理论问题。我也记得我们那时候访问香港家庭、上海家庭,如果你去问他男孩女孩有区别吗,他会说都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去观察他的消费行为,在选择玩具上就会有异性化的差别,所以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

戴:但是我覺得在上海这个差别就不大,因为都是独生子女。但是有阶级差别,这是另外

一个问题。

卢：那么回到维克多·倪的假设，你认为市场化不能够消除不平等，反而会造成差距拉开，从消费方面你是不是也能看得出来？

戴：看得出来，但是很复杂。因为到现在这种变化还在进行之中，可能从今年开始这个差别会越来越大。但是在1998年或1999年的时候，住房还是很平等，交通工具的差别还可以，吃得也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很多补贴还在，社会分化看得不清楚。在一般城市里的生活中，吃、穿、住、用还是比较相像的。市场化开始的时候当然会有阶级差别，但是并不那么简单。不是以前理论上描写的国外的资本家，你会知道无产阶级住在这儿，资产阶级住在那儿，他们按照完全不一样的方式生活。中国不是那样的，到现在还不是那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认为在中国年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阶级差别则会越来越重要。这里也有主流文化方面的差别。

卢：那么现在你觉得是哪一些阶层在消费方面能够显示出来它有一种特别的地位？

戴：经理层，所谓的经理阶级越来越大，这也可以说有的完全是靠市场形成的，还有一部分则是靠机关里面形成的。这是不一样的走向，可以说是两条路，但是还没有那么简单，总之不是一条路。

卢：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是处于从再分配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有些职务消费和待遇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形成特殊的经理层。

戴：这确实是一个特点。同时还要看到你们差不多有40年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对你们公民思想方面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在美国，一般的资本家，特别是大资本家，他不会管你工人够吃不够吃，这被认为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不用管，我们都是靠市场。但是我现在在中国仍然看到了这种情况，高级经理、厂长、机关里的领导他们还应该给所有的人考虑一下，因为他有一种“大同”的责任。那就是为什么我不完全同意第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的提法。我觉得社会主义的革命对你们还有好的影响，比如，你们给所有的孩子有机会读书，这在世界上很特别的。你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大国，你们比他们在教育方面发展得快一些，这是他们跟你们无法比的。另外，在医疗和公共卫生方面，你们的卫生部门在50、60年代有很多投资，可以说这是人力方面的投资，是一种基础。此外，我也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家跟国外的私营企业家也不一样，我认识几个，我也访问过他们，他们有一个梦，就是自己要发财，但是你跟他深入讨论的话，他也考虑工人的情况，关心他的邻居的情况，这也是比较特殊的。

卢：我前几年写过文章，就是讨论中国的“集体社会主义”问题。由于中国社会从根本上看不是由个体之间的联系发展起来，而是由“族群”联系起来的。这种社会“早熟”的现象使中国人思考问题会有“群”的潜意识。所以中国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且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先天的群体倾向。一旦国家的强权向社会“让予”了以后，族群集体的社会主义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种群体的社会主义对外是讲市场，讲竞争，而对内大家还是要讲“社会主义”，讲公平分配（卢汉龙，1999）。

中国消费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与特点

戴：我倒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假如你觉得我说得对的话。我认为你们的私营（企业）家跟国外的私营（企业）家的一些看法现在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觉得过了十年，还会有这个差别吗？

卢：我觉得这要看整个大的社会形势是怎样发展的。这可能是一个文化交融与变迁的大问题。比如在中国的市场化转变过程中，现在也非常强调法治，就是根据法律来规范公众行

为。其实法律背后提倡的是理性精神,就是用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很多公共的事情。但是我可以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超理性”的,或者说仍有相当的感情色彩在其中。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采取渐进策略,实际上一直在强调“市场无情,操作有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市场竞争“残酷”的一面在意识形态上是不支持的。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在整个转变过程中它需要讲中国式的“人情味”。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这个能不能在十年或者几十年里有改变我觉得难以肯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有多困难的原因之一。近20年以来的法制建设遇到了“立法公正”和“执法难”的问题。我想在私人产权和私人企业家的地位和行为会不会转变上大概也同样会有类似的问题。

现代西方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社会,认为法制化和理性化是效率比较高的一个社会,至少在建设物质产品方面是这样。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确实很难做到一致认同。而且,我也发现西方社会也在反思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也觉得科学可能也是一个两面的东西,因为它永远不能穷尽真理,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比如现在的人太聪明了,对自然就剥夺得太厉害,破坏了环境。你们太理性了,人和人之间就可能只讲法律,撇开法律会有漏洞不讲,单是施行法律的成本本身就很高。我们看到你们美国整天在选举上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与金钱,为了打官司,也不知道要用去多少人力与物力。而这在中国可能就是由一个有权威、有德行的人,由他来判断一下,或者通过一些调解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一些偏爱中国文化的人会觉得这样做也未尝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可能双方的文化都在不断的反思。其实作为我们学者来说,对于消费文化的兴起我们当然是很欢迎,的确它在这20年里面给中国人民带来非常大的生活上的改变;但是的确我们也会有西方学者的某种担忧,消费文化走过头了,也有它本身的问题。正如我们中国人以前为什么是排斥商业的,中国本不是崇商主义的,中国历来的统治阶级也好,或者说社会民情也好,看不起做生意的人,因为中国人觉得人跟人的交往首先不应该是讲利的,不是利益优先的,而应该讲“义”,就是讲社会互惠,讲怎么来维系这个社会关系,讲相互的信任,讲相互的感情联络。

戴:对于中国文化历来重农抑商的问题,我认为,也许孔子说他看不起商人,但是从国外来看中国人,我们看得出来在南洋、美国、台湾、香港的华人社会里,商人的地位蛮高的。你问一个美国人,中国人会做生意吗?他肯定会说“是”,中国人都会做生意。这是为什么呢?从宋朝开始——宋朝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化时期,如果把这时候的中国和欧洲做比较,中国是跑到前头的,宋朝比当时的欧洲更加商业化。从商品化和合同来看,你们订合同的历史比我们的都长。你们的农民——我说得也许不是很确切,从唐朝已经开始有合同。你们的农民种田,但是他还会有副业。这是第一个问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矛盾。你刚才说的是正史,说中国看不起商业,商业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们从比较历史看得出来,中国(商业)是最发达的。我认为中国的法律、道德行为和家庭策略中的商业根基对整个市场极为有利。当然你会说还有社会关系网对市场的作用呢?也许中国是有所不同,但实际上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假设。

卢:也有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轻视商人,或者说中国的主流文化要排斥商人,就是因为中国人其实就是很会做生意。这跟你观察到的结果相同,但是结论却不相同。他们的结论是,正因为中国人会做生意,造成政府,或者说皇帝,一定要控制这些做生意的人。因为生意人创造的物质资源一定要能够被国家控制,才能保证公平。所以主流文化就排斥商业,而且或者说“官”与“商”要“勾结”在一起,所以私人的资本主义反倒好像就发展得比较

慢,是不是有这种看法呢?

戴:应该看是跟谁比较。如果是跟苏联或俄国比较的话,那当然中国官方对商人的控制比他们发达,跟法国比可能差不多,但是英国跟荷兰这两个国家就不一样。你会发现它们的皇室也想控制商人,结果发生的革命就是商人起来推翻国王。使我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官方解释是“中国是一个瞧不起商业的社会”,但是如果你客观地来看的话,它实际上又是一个商业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这其中存在着矛盾,即官方解释与人们看到的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有矛盾。所以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个假设。事实上,如果中国人相信一直会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当然不得不相信。但还要留待进一步发展事实的证明。

从住房消费和产权看公私领域

卢:听说你最近在使用中国住房消费方面的资料准备写一本书,能不能借此机会简单介绍一下主要的观点,让我们先闻一二?

戴:这本书可以说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很一般的,就是研究研究政策,了解从1980年到1999年20年以内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怎样改革。第二个部分是比较抽象的,讨论私人空间。讨论私人空间对中国人来讲有什么意义?就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人喜欢有他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看法。以前有人说中国人没有隐私,靠访谈是谈不出来的。我自己的经验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可以了解的,他有自己的时间,他要安排他自己的时间。按照时间来说,你可以说他有私人的时间。后来你看得出来,他的收入高了,他可以买房子,他也希望买自己的房子,因为这是他私人的空间。从私人时间到私人空间是很重要的变化。所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讲隐私是如何实现的,以及隐私对中国人来讲意味着什么。第三个部分就是研究产权的问题。在住房产权上有好几种,是个人的产权?还是公共的产权?或是家庭成员共同的产权?重点是要了解这个“家”(home)的产权。用英语说就是 domestic property regime。在理论上我们经常谈论产权和产权制度改变,不过基本上谈论的都是工业方面的产权,如工厂、商店等生产上的产权;但是你看看世界上最一般的产权是什么?是他们的房子,所以我想通过研究房子的情况来了解这个产权制度,了解中国真实的产权制度,了解人们如何利用这些权利来形成社会、认识自己并发现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三点,当然,与公共领域又有了联系。

卢:对,这就牵涉到公共领域,太有意思了。从产权构成里你怎么来看公共领域的问题?

戴:因为这个产权是一个人的财产权,要有矛盾的话,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与国家的,还有一种是跟别的公民的。两个公民之间有矛盾,他怎么解决这个矛盾?他应该去找一个法庭,那个法庭里面怎么决定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就非常有意思。由此,产权这种语言就变成了解决公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语言。我们开了各种不同对象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们将从中国报刊上登载的一些房产纠纷的读者来信念给他们听,请大家发表意见谈谈看法;然后再将报刊编辑部请法律专家对这些纠纷的司法性回答念给他们听,再听他们的意见。你参与我的研究你能理解,司法解释和民间解释会有差别的。还有,用法律方面来解决问题的话,你也应该看、应该听中国人怎么决定他有道理还是他没有道理,他怎么用产权语言来声明自己的主张。如果要讨论公共领域,这个是跟产权、权力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公共所有的,还是个人所有的。通过对产权的讨论,我想我们可以对当代中国关于公共和私人的界限了解得更加清楚。

卢:在这个研究中间你觉得西方和东方有什么重要的差别没有?

戴:可能最大的差别就是家庭的情况。20世纪在欧美国家产权是个人的,但是在中国很多是家庭的,而且还是共同所有的,可能这是个最大的差别。这里是一种中间地带的状况。因为你想想在西方的法律中尽管它不是非常清楚,但至少比中国清晰,存在着一个公共所有制和一个私人所有制。中国的情况照我来看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中间地带,那就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最重要的基地是家庭,可以说家庭所有制。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西方的集体所有制,只有在最高级的皇室方面有,它们有家庭所有制,但是一般的人没有这个,也许有,但是没有那么重要的。但是在中国可能很重要,特别是在农村里面集体所有制还是重要的。这是一个假设。

卢:这或许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社会是一种“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这也可以证明中国人的社会“以群为本”而非“以人为本”,集体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比较大的接受度和发展空间。现在从消费领域体现出来的产权思想越来越明显,直接增加了对消费者自主性的保护。私有产权或你所观察到的集体产权对社会的分化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戴:你曾经提到过,由于长期的物质缺乏,中国人也许会有一种想通过消费来显示自己财产的欲望。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很难说美国人就没有这样的欲望。但是物质上的东西是有限的,对于物质的衡量和文化的衡量哪个更重要必须从假设开始。1998年我们一起工作时我的假设就是,我们不能假设生活水平和文化修养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不一定是一二三四的,也不一定就是他有一级的生活水平,他有二级的生活水平。就是说,住的、穿的、吃的、用的什么的、还有收入等等的,是分散的、分割的(segmented)。这意味着能有这样的一个“阶级”,比如像通常说的知识分子,他们文化资本蛮高的,经济资本或是生活水平可能比较低,但是他以为他是一个阶级,这就是代表了一种生活水平,一种阶级的情况和一种阶级地位。另外还有比如专业方面的,可能是靠种田为业的,不一定是按照所有的“资本”来比他是低了还是他高了,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你要看一个社会也许它是由阶级(种类)来分割的,但不一定是分等级的,这就是一个假设。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假设呢?在美国,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阶级地位跟他对别的方面的看法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政治方面投票的事件,他要知道谁把票投给戈尔,谁投给布什,要考虑一下这个阶级地位跟别的社会结果有什么关系。假如我们假设有一级、二级、三级、五级的,这不能说明我们的问题。这个是你们看社会的一个看法。但是假如我们用消费方面的指标,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生活地位的观点,就是从这样的阶级生活看别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那么简单,阶级分析我认为是太简单化了。

参考文献:

费尔南·布罗代尔,1992《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

卢汉龙,1999《“墙头经济”与集体社会主义——从单位办“三产”看中国的产权文化特点》,《学术季刊》第3期。

Davis Deborah S. 2000,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录音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梁海红
责任编辑:张宛丽